

◎夏明星 刘红峰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形势需要，中国把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俗称“八字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俗称“四字战略方针”）。

“‘诱敌深入’是毛的军事思想遗产”

还在1930年10月30日，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反共“围剿”，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就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的军地联席会议上力排众议，断然决定：“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在“诱敌深入”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左”倾路线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大加挞伐，讥讽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指导下，中央红军遭受重挫，中央苏区损失殆尽！

1935年12月23日，在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毛泽东就“战略防御”精辟指出：“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这是他第一次把“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整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可以相提并论，“诱敌深入”是“积极防御”的题中应有之义。

1936年12月，总结十年红军战争经验教训，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文，他在第五章专门论述了“战略防御”问题，其中第一节是“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第三节是“战略退却”。他认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他把“诱敌深入”提到了战略层次即“战略退却”，高屋建瓴地指出：“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完全有计划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诱敌深入”是实现“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手段。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运用“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思想，勇于以“存人失地”方针取“人地皆得”战果，打败了国民党。

1949年5月23日，面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危险，毛泽东就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致电邓小平、刘伯承等，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10月1日，新中国崛起于东亚，“积极防御”事实上成为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新中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国进行了殊死较量，这是典型的攻势防御。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时刻不忘“诱敌深入”，不时致电前线指挥员：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的电报（1950年10月24日）、关于赞同诱敌深入定（州）宣（川）泰（川）龟（城）区域的电报（1950年10月28日）等。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美国有可能从南北两线对中国的入侵，毛泽东曾总结性地指出：“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

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冲突,中苏大战一触即发,毛泽东决定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4月28日,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到了70年代后期,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终于并称,成为统揽全局的军事战略方针。谈到中国的战略方针,有外国军事评论家说过,“‘诱敌深入’是毛的军事思想遗产!”

“讨论‘诱敌深入’体现了思想解放”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国军事理论界受到极“左”思潮干扰,那时讨论“诱敌深入”问题是有风险的。当年,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就曾因言获罪。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耻于在朝鲜战争中遭到重挫,又在中南半岛频频生事,后来干脆直接出兵越南战场,战火一步步逼近中国的南大门。如何应对美军的可能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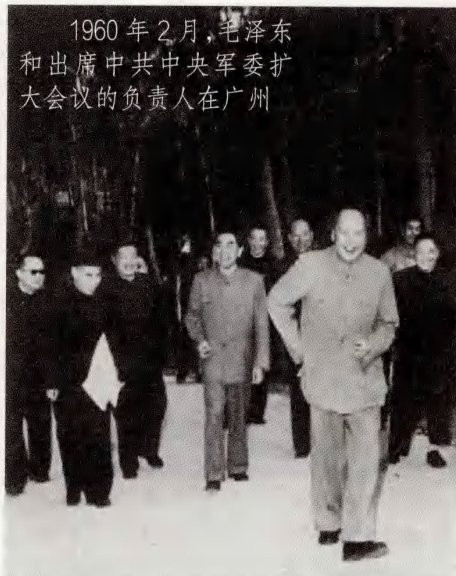
国防部长林彪认为:“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1960年一二月间,根据上述认识,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在浙江沿海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浙江沿海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够以苏联为依托。在积极防御问题上,林彪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把“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等同起来。

对于“积极防御”,罗瑞卿自然赞同,但对于“诱敌深入”则表示不愿苟同。他认为,“现在条件不同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曾在朝鲜战场成功挫败过美国,“要把敌人顶住”——随便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会伤害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感情,因此

应该尽可能采取“堵水的办法”,“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今天看来,尽可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要把敌人顶住”而不随便“诱敌深入”,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所系。况且,对“诱敌深入”有不同看法,也不代表就是“反对积极防御”,所以罗瑞卿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文革”中罗瑞卿被“打倒”、“批臭”,军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并被批转全党,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掀开了思想解放的乐章。对于军队来说,“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是最大的命题。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军事学术》编辑部”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文,这是军队思想解放的号角,文中指出:“片面理解而不重视全面系统学习的现象,在一些同志中间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有的同志认为是战争全过程的方针,理由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有的同志则认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方针,因为毛泽东同志只把积极防御列为战略防御的一个内容,并指出当我军的力量超过敌人时,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而防御就成为局部的东西了。

1960年2月,毛泽东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负责人在广州



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可以研究,但是,只抓住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作为立论的根据,显然是不行的。”这种“只抓住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作为立论的根据”现象虽然不好,但能够研究、探讨“积极防御”,说明研究、探讨“诱敌深入”也成为可能。所以,当时有人说,“讨论‘诱敌深入’体现了思想解放,以前想都没敢想,更不要说去讲!”

“诱敌深入”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

1978年12月16日,携手应对苏联挑战的中美两国,同时公布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同时,美国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并终止1954年12月同其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岛上撤走

美国军事人员。1979年1月,邓小平成功访美,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样,美国、苏联、中国构成了“战略大三角”,根据“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政治几何学定律,中美接近已经对苏联构成战略优势,加大了苏联对中国大打出手的战略成本。

当时,苏联支持越南搞地区霸权主义,又出兵侵占柬埔寨并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构成了“南北夹击中国”的严重军事态势。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对越南进行了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次作战达到了惩罚地区霸权主义的目的,也给苏联军事扩张一个警告,是一次成功的“积极防御”。这时,苏联出于战略全局考虑,没有为援越而对华采取军事进攻,放过“南北夹击中国”的大好机会,说明其悍然入侵中国的底气也不足。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侵占阿富汗,在进一步形成对中国战略包围之势的同时,其南下战略也威胁了美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苏联很快陷于阿富汗这个泥潭不能自拔,遑论入侵中国。

在美国无意、苏联无力入侵中国的情况下,“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诱敌深入”显然就不合时宜了。

另外,诚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所言:“到了80年代,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进行了30年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家业。如果外敌大规模入侵,一开始就把侵略军放进来,可能会使后方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容易引起混乱,在政治上对我不利。而且,敌人向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会采取突然袭击、长驱直入的手段。如果外敌从东南沿海登陆,我们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那么沿海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很快就会陷入敌手。这样,我国的经济命脉、重要基础必然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利于我军积蓄反攻力量。至于东北、华北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因而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间,稳定战局,制止侵略军的长驱直入,从战略上讲,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坚决抗击入侵者。更何况,我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担负以坚守防御阵地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作战任务。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战略方针中是否仍保留‘诱敌深入’的提法,确实值得研究。”

此外,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积极为国家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和平大国的国际

形象深入人心。此时,还在军事战略方针中提倡“诱敌深入”,会为某些不怀好意的国家宣传中国“好战”提供素材。况且,在苏联侵占阿富汗后,其兵锋逼近中国的战略重心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一旦铤而走险发动入侵,它还可能以中国热衷‘诱敌深入’为借口,造谣诬蔑中国首先挑起战事”。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1980年9月,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建议把我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战略方针”。修改对战略方针的表述,是一件大事,总参谋部一直持慎重态度,反复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征求了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成员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大家都倾向于对战略方针作局部修改。在此基础上,总参谋长杨得志、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副总参谋长张震三人商量,决定分别向几位老帅汇报,听取指示,再作定夺。

杨得志首先向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总的还是打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及其具体化问题,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9月14日,按照杨得志的指示,张震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叶帅表示: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同志们讨论的情况,同意用“积极防御”的提法,但这仅是他个人意见,还有待军委讨论、批准。

9月20日,杨得志、杨勇和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帅汇报。徐帅也同意对战略方针的表述作适当调整。他强调: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管武器怎么发展,不管什么情况,战争的性质还是人民战争,还是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是进攻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但对此理解上也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化。徐帅还联系历史,具体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守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朝鲜战争时我们守“三八”线,还不是都守住了嘛。因此,在北京军区方向,我们要构筑工事,坚决顶住入侵之敌的进攻,不能搞“诱敌深入”。在北京和各个重要方向,要构筑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每进攻一个地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们则可以争取时间。敌人

就怕这个,因为他们拼人力是拼不过我们的。关于联合作战问题,平时就要编好,打起仗来,临时编不行。应该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

1980年9月30日,张震等又将这一情况当面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作了报告和请示,得到了他的肯定。10月15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上讲话,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我们总是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

抛弃“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诱敌深入”,用言简意赅的“积极防御”作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外电反响强烈:“‘积极防御’任何外国军队并拒绝外国军队任何形式的‘深入’,表明中国军队已经自视为一支不可侮的力量!应该承认,‘积极防御’四个字彰显中国自信!”这时,“积极防御”成为中国的战略方针,但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是应付世界大战。

1981年9月,根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国军队在华北北部地区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华北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建国以来我军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军事演习,而且是我军第一次以方面军形式组织的战役演习;更重要的是,作为邓小平1981年6月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他在亲自领导和指挥这次演习的过程中,全面总结了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施“积极防御”。

“叫法虽然不同,但实质一样”

把“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果断摒弃“诱敌深入”,其实没有本质的变化,正如贾若瑜将军指出的,“‘四字’与‘八字’的叫法虽然不同,但实质一样,而以积极防御作为我们的战略方针,则更为科学,更加确切,也更便于统一思想”。

再者,摒弃“诱敌深入”四字,也有利于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比如,过去一提“诱敌深入”,人们马上就与“放在国内打”相提并论。其实,正如许多著名军事专家指出的:

“诱敌深入”和“放在国内打”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对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们首先“放在国内打”,这主要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首先发

动战略进攻,但也决不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更不能设想战争一开始就举行反攻,把战争推到敌方领土上进行。这个战争首先是在我们的国土上进行的,消灭敌人的战场主要也是在我们的国土内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从政治上说,我们是被侵略的,有理;二是从军事上说,可以发挥我们人民战争的威力,利用预设战场进行作战,有利,好打。

而“诱敌深入”,则是在强敌进攻面前,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把敌引诱到预定地区予以歼灭。它是弱军对付强敌的一个有效军事政策。

但是,我国现在已是一个有巩固政权的社会主义大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和平建设,有了很大一批家业。这批家业是我们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决不能轻易让给敌人,必须保卫。必须坚决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军队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把战局初步稳定下来。

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我们从战略上讲是不能搞“诱敌深入”的,只是在完成战争初期的战略掩护任务,初步稳定战局之后,才能按照统帅部的统一计划和部署实施。战争初期,在主要战略方向上,不存在“诱敌深入”的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的问题。至于在次要作战方向上,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诱敌深入”,诱到什么地方,诱到什么程度,则要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决不可自行其是。

1985年5—6月间,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一基本判断。根据这个重要判断,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和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时,还是讲“积极防御”,但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开始从应付外敌全面入侵转向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在1988年12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后的新时期的战略方针,即“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确定在战略指导上要在基本稳定北线战略态势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南线的战略态势。■

(责任编辑:巫勇)